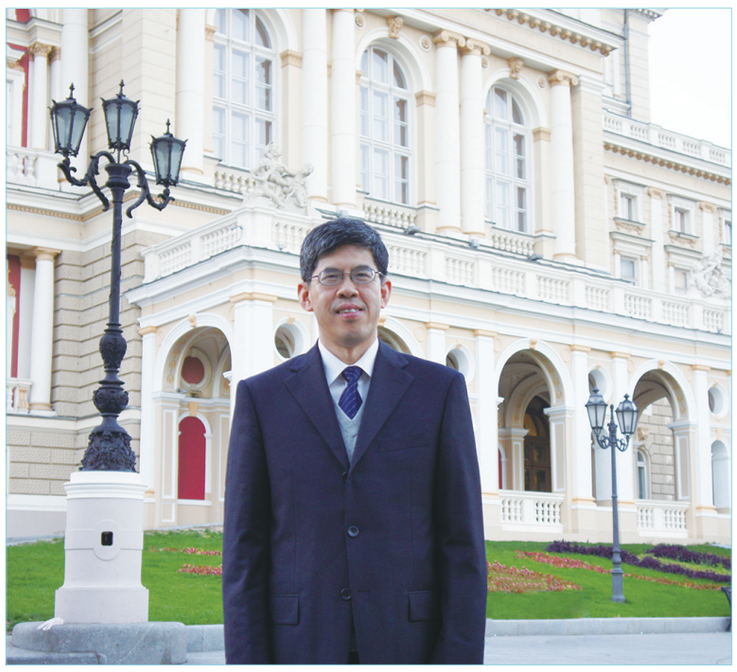
认认真真做编辑　踏踏实实做学问

——记北京市委党校高寿仙研究员



高寿仙，北京市委党校校刊编辑部主任、《新视野》主编、研究员，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。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，主要研究方向是明史和北京史。出版《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》《北京人口史》《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》《徽州文化》《中国宗教礼俗》等专著10多部。曾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

□ 余　茜

以做学问的态度做编辑

在北京市委党校主楼六层一间办公室里，高寿仙老师从早到晚都在忙碌着，不是与编辑讨论选题策划，就是埋头审阅修改稿件。编辑部的每一位成员，都能感受到他对编辑工作的热忱与严谨。他常对大家说：“编辑圈里有一句老生常谈，就是‘为他人做嫁衣裳’。这可不是贬低。大家想一想，新娘子出嫁时，嫁衣裳有多么重要？我们既然选择了这项事业，就要一丝不苟，尽心尽力，把‘嫁衣裳’做成靓丽的精品。”

高老师给大家提出一个明确要求，就是“以做学问的态度做编辑”，希望大家像自己撰写论文那样精心审编稿件。他强调要把好“入口关”和“出口关”。所谓把好“入口关”，就是认真对待每篇来稿，既不能以人取稿，也不能以人废稿，要仔细审查稿件是否符合本刊定位，内容是否有新意，观点和材料是否统一，逻辑结构是否合理，文字表达是否通畅等等，尽量从众多来稿中选出优质稿件。所谓把好“出口关”，就是对稿件精心编辑、细致校对，尽量避免出现病句错字，标点符号和数字用法严格遵守国家标准。在这方面，高老师以身作则，他终审清样时，都是仔细审校数遍，小到标点符号，大到标题内容，无不细心斟酌修改，绝不放过一点疑问，有时为了一句表述、一个数字，与作者反复沟通核对。

在决定文章取舍时，高老师特别重视文章的创新性。为了便于大家实际操作，他明确提出了“五新”标准：一是新的领域或方向，即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；二是新的方法或工具，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，提出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工具；三是新的问题或思路，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，使用原有的研究方法，提出了前人未曾注意的新问题新思路；四是新的观点或方案，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，针对原有的问题，提出了新观点新方案；五是新的资料或证据，即在原有的研究领域，针对原有的问题和答案，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新材料新证据。他要求大家在写审稿意见时，必须明确说明文章的创新点是什么，建议采用的文章，至少要符合其中一条，符合的条数越多，学术质量越高。

以做编辑的态度做学问

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，高老师还孜孜不倦地从事科研。每天晚上，他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很晚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。他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，书柜、书架上塞满了，就用书堆出一张床，现在这张“书床”上又堆出一座“书山”了。大家赞他刻苦治学，他笑着说：“我是在偏僻的农村长大的，上小学、中学时，学校教育不太正常，没有学到多少知识，先天不足，只能后天多花些时间弥补。而且我没有别的爱好，读点书，写点东西，其实就是一种业余消遣，乐在其中，哪有什么苦呀。”

针对编辑工作，高老师提出“以做学问的态度做编辑”；针对科研工作，他又提出“以做编辑的态度做学问”，意思是对待自己的文章，要像对待别人的文章一样，以编辑的“挑剔”眼光反复审视。高老师的很多文章，都是在读书笔记的基础上形成的，有些问题他想了很长时间，甚至初稿写成后，又“冷藏”了好几年才修改发表。

高老师的科研涉及面较广，在社会经济史方面用力尤深。他初入学术界时，正值中国经济转型腾飞，所以当时特别关注中国早期现代化问题，围绕伦理、法律与经济发展发表了一些文章。鉴于在传统中国，农业一直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，他对明代农业和农村进行了专题研究，除为《中国通史》《中国经济通史》《中国经济发展史》等大型学术著作撰写了相关章节，还出版了专著《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》，对明代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额、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、土地形态与生产关系、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进行了细致探讨，该书出版后颇受关注。

明代农业与农村研究告一段落后，高老师把主要精力转到北京社会经济史方面，经过10多年努力，完成了60万字的专著《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》，所论问题大多是前人较少涉及或者语焉不详的。高老师挖掘利用了不少新资料，比如关于明代中叶北京城市的人口规模，以往全靠猜测，高老师发现了一项五城门数统计数字，可以据以更加准确地估测当时的人口数量。其间高老师还承担了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“北京人口发展史”，其最终成果《北京人口史》56万余字，细致梳理了北京地区各个历史时期人口起伏变动的复杂轨迹，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，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

阅读高老师的论著，有一个鲜明特点，就是非常重视学术史梳理。在他看来，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、层层递进的过程，不充分了解前人成果，就很难作出实质性的贡献。无论研究什么问题，他都会广泛阅读中外相关文献，甚至写成完整的读书札记。其札记《关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回顾》发表后，成为国内学者了解日本相关研究概况的阶梯；另一篇札记《“行业组织”抑或“服役名册”?》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“行会”问题进行了检视和探讨，提出“行”并非实体组织的新见解。在充分尊重前人成果的同时，高老师还勇于进行学术争辩。比如他对明清社会经济史名家傅衣凌、黄宗智、李伯重、贡德·弗兰克等人的观点，都曾公开发表评论，既有诚挚的肯定，也有坦率的批评。2017年，围绕明清歇家研究，他在《光明日报》接连发表两篇商榷文章，受到学界关注，体现了他对学术的敬畏与执着。

打造学者型的编辑队伍

高老师特别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，提升团队的整体能力。编辑部增加了新成员，他都会及时与其沟通交流，花费很多时间阅读他们发表过的文章或学位论文，以便准确了解每位同事的长处和短处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大家提高。高老师给年轻编辑提出明确要求，就是必须编辑与科研并重，不能一条腿走路。他对他们说：“关于编辑学者化的问题，编辑界有不同看法。但我个人觉得，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，学者化应当是一个硬性要求。自己不搞科研或者搞不好科研，就很难锻炼出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前沿的学术意识。”他还采取许多具体措施，帮助年轻编辑提高编辑水平和科研能力。

在编辑方面，新编辑一报到，他就会抽出时间给予专门辅导，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，从选题策划到组稿、审稿、编辑、校对，各个环节都讲得十分具体。他还让大家传阅他审校过的清样，特别是那些改动较多的文章，这种方法特别有效，大家可以直观地了解哪些地方、哪些方面容易出现问题，从中还学到不少修改文章的技巧。在科研方面，新毕业的博士，对于下一步做什么、怎么做，有时会感到有点踌躇，高老师除大力鼓励和督促外，还帮助大家分析自己的特长，确定合适的主攻方向。大家申报课题时，也会请他审阅论证报告，他每次都看得很仔细，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。

在高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，最近几年新到编辑部工作的博士们，都觉得自己进步很快，编辑方面都已能独当一面，大家都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发表了一批科研成果。大家觉得，校刊编辑部这块小小的天地，为他们提供了快乐工作的环境、不断向上的动力。

党校人风采





看近代北京　通古今之变

□ 王　均

相比于研究积累相对丰厚的古代城市，对近代城市的关注相对偏重在近代变化发展特征显著的沿海城市，比如上海、天津、青岛等。对于北京、西安、南京、杭州等由古至今连续演变的内地城市，对近代时期的学术关注相对集中在政治人物、纪念地保护、市政建设、社会生活、近代建筑保护与利用等方面。

近代北京有怎样具体的特征值得回顾呢？从党史和政治角度会关注人物及事件，从教育角度会关注近代学府和学生运动，各有所重。笔者认为能体现城市时代特征、能综合汇聚学界和社会关注的要点有以下四个方面。

城市的开放、城市风貌传承与建成区拓展。近代北京的城市开放一是体现在人口流动和增长，开放八旗营制和住籍管制。二是在建筑上拆除交通壁垒，打开城墙阻隔，把封闭园囿开放为市民公园，把故都风貌展示传播，通过摄影摄像和文字美术，在国际上为人所知。在面临城市发展与旧城风貌发生矛盾的时候，我们大多知道梁思成、陈品祥提出西郊新建的规划思路，并为之回味和惋惜。而实际在1930年代，就曾提出过完整的保护旧城、在东郊西郊规划新市区的规划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建设实施，打开了城墙，后来命名为复兴门和建国门。从城市学科的学术研究上发掘历史知识点，有助于社会对城市发展脉络和惯性方向的理解。

疏散城市功能、调整发展方式的再现。1928年的国都南迁，北平由政治中心城市转为文化故都，可以理解为疏解城市功能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一次历史案例。为此，当时的市政长官袁良等身体力行，在各种不利的社会环境中，进行了故都文物整理和保护，提出《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》，与河北省协商拓展四郊市域的计划，力图改造消费城市为工商业生产城市。这些都是曾经付出的历史实践，值得今后的市政规划和发展在遇到相似进程时借鉴。

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启示意义。近代北京的市政概念自1901年警察的组建而起步，城区道路建设、街道卫生、地方捐税等近代市政事务出现。在1914年开始设置京都市政公所、京师警察厅分别管理市政和治安事务，城市财政初步形成。1921年曾公布系列法律文件，至1928年设置北平市，实现了制度保障下城市管理。在1928—1937年间，以及光复后的1945—1948年间，北平市政府颁布实施了很多市政管理的具体措施，《市政公报》印发周知，也有林颂河《统计数字下的北平》及陶孟和《北平生活费的分析》等详实的社会调查报告等渠道，向社会传递城市管理中真实生动又具体的信息。

城市生活的体验和表达。目前的“北上广”面临着现实的城市生存压力，回顾“老北京”，在文学记忆和城市体验上似乎又是值得留恋的舒适。具体内在的因素是怎样的呢？当时的分析有“三十年代的北平虽然是个衰退中的城市。但从明代永乐年间开始做了五百多年首都，一下子丧失了这一地位，过剩的建筑、设施、用品、行业、人员劳动力，不知有多少”。因此，“在这个城市里的日常生活，却相当舒服；这是当时的北平之值得眷恋之处”。在传承历史文化风貌、传承城市历史记忆的过程中，当时不同阶层、不同居住条件的市民的体验和表达是多样的。由此，在应对来自城市内外、社会各界各种诉求和期望时，合理有效地实施城市治理能力，也需要城市社会调查研究的保障，准确理解民情民意，以促进城市的和谐治理。

深度观察

社会科学治史：清华史学的传统

学术评论

□ 仲伟民

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传统，博大精深，弘扬优秀的史学传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手段之一。中国史学传统不断发展、完善，从司马迁到司马光，再到章学诚，在内容、体例、方法诸方面，都发生了极大变化。尤其到了20世纪初期，中国史学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。

与其他大学相比，清华大学对历史学的看法到底有何不同？最大不同就是蒋廷黻先生提倡的社会科学治史的方法，他把这种全新的方法贯彻到教学与科研过程之中。其中有两个具体的做法，一是强调历史系学生必须兼修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法学等课程，以便进行跨学科研究；二是在历史学领域内，要求读西洋史，认为既要了解西方史学的观点和长处，又要了解西方历史发展的实情。

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“社会科学治史”理念的影响下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，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。1934年5月，一批青年学人在北京成立了“史学研究会”，主要发起人为吴晗和汤象龙，成员有夏鼐、罗尔纲等，多数人都有在清华学习的经历，因此又被称为“清华史学研究会”。“史学研究会”并非有师承关系或研究实体作为支撑，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治学取向。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，援引社会科学方法进行史学研究，倾向于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分析历史问题，反对理论脱离历史实际和从理论到理论。他们成功运用社会学、经济学、统计学等方法重新解读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，发表了大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，成为当时“社会科学派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社会科学派”中的清华学人，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作为一个学术流派，他们具有鲜明的治学特点。第一，紧跟国际前沿，倡导中西会通。他们主张用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问题，但又不完全否定、批判过往的历史研究方法，怀有浓厚的民族本位情怀。第二，尊重材料事实，不教条不盲从。他们承认各种社会科学理论都有其各自的局限，在史学研究中秉持“训诂治史”的底线，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。第三，重视统计方法，开展计量史学研究。梁方仲、汤象龙、吴承明等学人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第四，强烈的现实关怀，炽热的爱国情感。清华学人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注重历史问题与现实环境、国家需要的结合。汤象龙对于鸦片战争经济原因的分析、蒋廷黻将政治学理论引入中外关系的研究等学术成果，体现了清华学人将学术研究与国家、民族命运相结合的治学特点。

而今，清华史学又继承了“社会科学治史”的优良传统。目前最具特点的，是李伯重教授的社会经济史研究，他关于明清江南、早期工业化等方面的研究，不仅引领了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趋势，而且把清华“社会科学治史”的传统带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